

华中师范大学一二〇周年校庆丛书

丛书主编 / 马敏 黄晓玫



悠悠岁月，赫赫史册。沐浴着新时代的朝阳，  
华中师范大学迎来了自己的110年华诞。

抚今思昔，追根溯源。奋进在新时期的前沿，  
华中师范大学倍加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

# 华中师范大学校史

## (1903—2013)

HUAZHONG SHIFAN DAXUE XIAOSHI (1903-2013)

◎ 马敏 黄晓玫 汪文汉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二〇周年校庆丛书  
丛书主编 / 马敏 黄晓玫



# 华中师范大学校史 (1903—2013)

HUAZHONG SHIFAN DAXUE XIAOSHI (1903-2013)

© 马敏 黄晓玫 汪文汉 主编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师范大学校史(1903—2013)/马敏,黄晓玫,汪文汉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华中师范大学 110 周年校庆丛书)

ISBN 978-7-5622-6279-4

I. ①华… II. ①马…②黄…③汪… III. ①华中师范大学—校史—1903—2013

IV. ①G659.28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7392 号

### 华中师范大学校史(1903—2013)

©马敏 黄晓玫 汪文汉 主编

责任编辑:郑燕 冯会平

责任校对:王胜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 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660千字

开本:1/16 787mm×1092mm

印张:35.25

版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79.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 《华中师范大学校史(1903—2013)》编撰委员会

主 编:马 敏 黄晓玫 汪文汉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王汉华 白调玉 刘祖芬 汪文汉

余子侠 张安明 周挥辉 黄晓玫 覃发高

喻本伐 程秀莉

## 前 言

悠悠岁月，赫赫史册。沐浴着新时代的朝阳，华中师范大学迎来了自己的110年华诞。

抚今思昔，追根溯源。奋进在新时期的前沿，华中师范大学倍加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

华中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追溯其根由，她以1871年的文华书院为源头，以1903年文华书院所设立的大学部为起点，以1924年在文华大学基础上建立的华中大学为主体，以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多元结合为前身。这些都是有稽可考并经过专家论证了的。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校在中发展曾几易校名。1951年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组建时，学校名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等并入后，学校又改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华中师范学院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由中原大学创始人之一——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在110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在时代的风雨中兼程，在历史的嬗变中新生，在建国后的曲折中前进，在新时期的改革中发展。华中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历史和辉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

百年树人，桃李芬芳。学校始终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以传承人类文明为宗旨，为国家培养了近30万名优秀人才。在建国前约半个世纪中，学校培育了大批英才，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人物。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湖北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恽代英及其战友林育南、黄负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中央人民政府前教育部部长何伟，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前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中国首译者王亚南，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中国科学院院士应崇福以及台湾知名人士李焕等。

在建国后约半个世纪中，学校立足湖北，服务中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为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批合格师资及教育管理人才，成为中南地区“人民教师的摇篮”。据统计，仅在湖北地区，就有超过60%的特级教师是华师校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班主任”陈振翠，首届“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汪金权是毕业于华师的数以万计的优秀教师及教育

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在学校培养的人才中,还有一些在中央和省市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英才。学校也拥有文艺界德艺双馨的曲艺家夏雨田,荣获美国总统奖的留学人士李静等知名校友。

高等学校是传承文明、创新知识的学术重镇,是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神圣殿堂。在110年办学过程中,学校曾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不乏大师级学者,如国学大师钱基博、黄侃,哲学大师冯友兰,经济学大师王亚南以及在我校前身执教的包鹭宾、游国恩、傅懋绩、桂质廷、张资珙、卞彭等。建国以后,我们的学校涌现出了杨东莼、韦卓民、詹剑峰、张舜徽、陶军、高原、高庆赐、张景龄、章开沅、邢福义、刘连寿、李会滨等一批学术巨匠。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各自学术领域内辉煌的一个标志,他们的业绩和声誉已经熔铸成学校的知名品牌,为学校在海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尤为可喜的是,在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又有一大批学历高、视野宽、后劲足、富有朝气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中青年学者在日趋成熟,不断地脱颖而出,他们是华师的未来,也是华师的希望。

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校既继承了中国历代文化教育的传统,又吸纳了外来文化教育的养分,而且融合了现代文化教育的精华。经过一代代的沉淀积累,一次次的发展创新,学校优良的校风、学风逐渐形成,并升华为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凝聚成一种华师人共同铸造的校魂,即“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

说起“华师精神”,我们忘不了华中大学“立足本土文化,放眼人类文明”的教育理念,忘不了中华大学“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治校准则,忘不了中原大学教育院所坚持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崇高信念。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在“华师精神”的传承中得到了应有的珍视和弘扬。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我校定位于“师范教育”。学校据此制定了“忠诚、奋发、博学、乐育”八字校训,以此统摄办学思想,规范育人行为,一直倡导“尊师爱生”、“为人师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教育观念不断更新。在筹备建校90周年活动中,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学校确定了“求实创新、为人师表”的新校训,1998年经讨论修改为“求实创新、立德树人”。“华师精神”作为华师人的群体意识、人格共性,在不断地闪耀着光辉,作为华师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想追求,在新的世纪得到了发扬光大。

历史宛如一条不舍昼夜、永远流淌的大河,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保持创造态势的“动词”。优良的传统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增值的。110年过去,如今,华中师范大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明确提出了以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综合性

研究型高水平大学为办学目标,以“以生为本、以师为先”为办学理念,以“一流的文科、高水平的理科、有特色的工科”为学科发展战略,以“忠诚博雅、朴实刚毅”为大学精神,着力培养引领教育发展的未来教育家以及推动国家、民族与社会发展进步的领导者和精英人才。

回顾 110 年历史,展望未来前景,我们充满自豪,也满怀信心。华中师范大学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一定能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优异的办学成绩,谱写新的华章,再创新的辉煌。

# 目 录

上 编 .....	1
第一章 文华大学(1871 年—1924 年) .....	3
第二章 华中大学(1922 年—1951 年) .....	19
第三章 中华大学(1912 年—1952 年) .....	75
第四章 中原大学(1948 年—1953 年) .....	127
中 编 .....	149
第五章 公立华中大学(1951 年—1952 年) .....	151
第六章 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2 年—1953 年) .....	160
第七章 华中师范学院(1953 年—1985 年) .....	167
下 编 .....	217
第八章 华中师范大学的长足发展(1985 年—1993 年) .....	219
第九章 在深化改革中迈向 21 世纪(1993 年—2003 年) .....	266
第十章 华中师范大学的跨越发展(2003 年—2013 年) .....	317
附 录 .....	375
后 记 .....	555



# 上 编



# 第一章 文华大学

## (1871年—1924年)

### 一、文华书院的设立(1871年—1903年)

文华书院创办于1871年。它是西方基督教向东方扩张传教的历史产物,也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时代结晶。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早在公元7世纪就传入中国,时人称为景教。13世纪,基督教再度来华,人们称其为也里可温教。16世纪,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其时来华传教士属于天主教一支。基督教这三次来华均以传教布道为主要活动方式,而且为时短暂,故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大的影响。1807年,基督教新教人物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带着英国伦敦会寄予的“进行讲学”和“教授英语”的希望来到中国,从此开始了基督教第四次来华的历史行动,也开启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进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为初期活动艰难的西方传教士打开了进入中国社会的通道。《南京条约》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们获得了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购置土地、设立教堂等特权。在建教堂、办教会、开医院、播“福音”的同时,传教士们记取了文化冲突的历史教训,借鉴了“学术传教”的历史经验。为了缓解中西文化差异的矛盾,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为了造就一批中国教徒,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相继办起了一些具有私立性质的教会学校。据有关史料显示,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传教士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办的教会学校有50余所。其中仅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香港、上海两地,就各有教会学校10余所。

九省通衢的武汉,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水陆交通的便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很快受到西来殖民势力的关注,亦为传教士所重视。19世纪60年代初,传教士紧随商人之后进入武汉地区,旋即于1862年在汉口设立教堂。到1866年时,武汉地区已有传教士教师计外籍3人,华籍5人,男女教友40人。据史料记载,1868年时汉口已有外籍牧师7人,礼拜堂8处,吃圣餐者207人,并有198名男孩和女孩在传教士办的义学中就学。可见其时基督教教会已在武汉地区打下了一定的事业基础。主持创办文华书院的美国圣公会(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将其势力影响扩伸到了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美国圣公会一向认为教育中国青年一代是自身一项最重要的事工。该教会组织第一位来华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于1845年到上海就职后,就在那儿开办了一所教会男童学校(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圣约翰大学)。1866年,圣公会决定在华中地区开展宣教事业,以武昌作为中心点,打开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局面。于是在1868年,该教会组织的文惠廉主教<sup>①</sup>即在中国籍牧师颜永京的陪同下,溯江而上,抵达武昌,着手圣公会的宣传工作。他们购置了武昌城东北角一块土地,作为后来文华书院的第一块地产。不到两个月,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成了一座小教堂,当年圣诞节正式启用。由于有在华中地区宣教工作的开创之功,1870年10月28日,颜永京升任为圣公会汉口教区的会长。他旋即积极参与筹办作为圣公会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姊妹学校——文华书院。1871年夏,文惠廉再度来汉并逗留了10天,促成了这所圣公会男童寄宿学校的兴建。3个月后,一栋带有起居室和厨房,占地264平方英尺(22英尺×12英尺)(1英尺=0.3048米)的二楼楼房建成。为了表示对1864年逝世于上海的文惠廉主教的永久纪念,学校定名为“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文氏学堂”或“文氏纪念学堂”)。

1871年(清同治十年)10月2日,只有一名教师杨用之的文华书院正式开学<sup>②</sup>。尽管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和住宿费,而且给以衣食和津贴(每人每天6枚铜钱),以此吸引穷苦人家的孩子,由于当时中国民众对外国教会及传教士普遍存有反感,故生源甚为缺乏。原定30人的招生名额,10月2日开学时,仅有刘玉书、刘玉阶、杨相衡等5名男童入学<sup>③</sup>,其中3名寄宿生,2名非正式生。一个月后,即11月2日,前述种种“优惠”发生了一些作用,学生人数增至14人。到圣诞节时已有学生16人,其中11人在节日受洗。1872年5月第二栋房子完工,当年11月学生增加到24人。1873年,学校有了正式的中文校名“文华书院”,除了纪念美国圣公会第一位来华主教外,也含有高尚典雅的中文“文章华国”的意思,但当地百姓一般称其为“大义学堂”。该年学生达到了原定30人的数额。到1874年5月10日,学生数上升到36人。1874年,文华校园内又出现了一所被称为“布伦女学”的学堂,系美国圣公会布伦小姐捐献4513美元开办的。在其可容纳40名学生的校舍

① 此文惠廉系上文所述美国圣公会第一位来华主教文惠廉之子,或称小文惠廉。

② 《文华大学(1871年—1921年)》(英文版铅印本),第1页。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华中大学档案“文华大学、华中大学”(英文复印件)。

③ 刘玉书、刘玉阶兄弟系湖北省汉阳府黄陂县基督教信徒刘尧臣之子。刘玉书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夏历六月初三日,病卒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夏历六月十五日。其弟刘玉阶后为汉阳感恩堂主教。杨相衡,字金亚,曾在刘玉书卒后撰有《哭窗友刘玉书》一文。

中,最初仅有4名学生,后来长期只有学生10名左右<sup>①</sup>。

按原拟计划,文华书院对前来受教的孩童教以地理、算法、扬琴、儒道诸书。学生按年序受洗于文主教名下,每逢礼拜三、六集会,礼拜一讲道书(即《圣经》),礼拜四讲儒书(即儒家经典)。每天早祷在上午9时,晚祷在下午5时。一段时间内,学校的教师只有杨用之1人,于是学校将学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学习中国文化课,一部分学习基督教知识。头20年间,学校全用学生的母语(汉语)进行教学,教程和教法与当时中国的私塾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学生们上午听课,下午复习,每学完一本书,教师都要求学生通过复习和背诵记住全部内容。学生在校没有周末放假休息的安排。学校将一年划分为3个学期,每学期结束后有一个短时的假期,这3个假期正好分别包含着中国的春节、端午和中秋三大传统节日。每学期结束都没有考试,学业检验就是平时检查学生的背书情况。

对于文华书院来说,1878年算是一个有些变易的年份。当年1月21日,学校首届神学班开课,在该班学习的4名学生,由上海教会常务委员会于上年选派而来。后来的文华大学神学院正是在这个神学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身于神学班和神学院的人,绝大多数被派到各地传教,不少人成为圣公会的主教、会长或会吏。此外,作为学校创建者和初期负责人的颜永京牧师,于当年受召返沪,负责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建设工作。接手颜永京主持文华书院的是苏道兴牧师,他在校长任上一直到1887年。苏道兴长校文华书院后,学校小有发展。1880年,学生增加到90名;1881年,学校又增设了英语课程。

1885年,巴修理牧师(Sidney C. Partridge)来到武昌。这位中文名为贝鼎三的教会教育工作者,在1887年10月17日接手文华书院负责人工作之后,在其长达14年的职任上,为文华从一个苦苦挣扎的小学校发展成为华中地区一流高等学府打下了前期事业基础。在巴修理的校长任期内,正值外国来华传教士及其教会组织在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时期。其时在一些开放较早尤其沿海地区,教会中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位于长江中游重要开放口岸武汉的文华书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所有的孩子不分程度均在一间房子里学习,巴修理到任后即将他们分班安排在不同的教室里上课。为了实现文华书院应该在长江中游起到像圣约翰书院在华东地区所起到的作用这一目标,巴修理不仅增设了课程,而且使学校学生的注册人数由过去的30名逐步增加到100名。同时,学校的校舍也有了增加,后来被称作“文华四合院”的三面,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认为,真

<sup>①</sup> 布伦女学于1899年更名为武昌圣希理达女学,后来发展为一所教会女子中学。清朝末年,该校迁至武昌小东门外。

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是单纯地传授宗教知识,而是要进而给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其成为教会中乃至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成为普通民众的导师和领袖。据此精神,文华书院升格为实行新式中学教育的教会教育机构,学制改为全程六年;学期划分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3个学期改为2个学期;周六下午不上课,每个学期末还举行一次考试。学校一年两假,暑假2个月,寒假即新年假1个月。1890年4月21日,在庄斯顿夫人(Mrs. W. S. Johnston)的指导下,英语部暂时设立起来了,西方历史、地理、数学课程也被引进课堂教学,体育训练也成了每日学校生活的一部分。5月1日后,学校配置了体操、游泳、单双杠等设施。很多人开始相信,西式教育对他们的孩子来说既重要又有益。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受战争的刺激,不少中国人对西式教育产生了新的认识,一些非教徒家庭也开始送他们的孩子来文华念书。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和学校事业的发展,1896年4月28日,文华书院首次向社会发出了招生简章,校园文化也开始丰富起来。1897年,巴修理组织了“圣提摩西联谊会”(St. Timothy Society)。这是文华的第一个联谊会,全校师生都可以参加。该联谊会的宗旨是帮助那些即将离开学校的年轻人,使他们进入社会后能学会自制和自尊。1898年3月14日,在巴修理的支持下,学校又出现了由学生们组织的“文华英语爱好者协会”(The Useful Knowledge Society)。该协会的宗旨是培养学生演讲的能力,增加使用英语的机会;在演讲过程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关心国内外时事。协会每两周举行一次集会,参加者在集会时用英语诵读、演说、辩论或进行其他竞赛,借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该协会成立初期,只有五、六年级学生有资格参加,1910年后,教师只能是该协会的名誉会员。

1899年,巴修理被推选为日本京都教区的主教,次年即走马上任。管理文华的职务由雷德礼(Rev. L. B. Ridgely)接替。巴修理的离开,似可看作文华书院一个时代的结束。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因其主题是反“洋教”,使处于长江中游的文华也受到影响而关闭了半年多。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打出了“新政”的旗号,在教育方面作出了全面引进西方学术文化以改变单一的儒学经典教育的决定。不久,拟订了新的学制,教育全面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教会教育的举办者们看到了中国方面的变化,为了取得基督教事业在中国的“最后的胜利”,在学校教育方面也及时地调整应对中国时局变化的方略。在1902年基督教在华组织召开的“中华教育会”第四届会议上,他们一方面对自身既有的教育工作成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另一方面积极地发出了《向外国差会请求派遣有训练的教育家来华工作的呼吁书》,强烈要求各国差会尽快向中国派出大批真正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01年接任文华校长的詹姆

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中文名翟雅各),着手准备将文华的教育事业向大学教育阶段推进。

来自英国的翟雅各上任之后,努力把西方学校的办学理念尤其是英国公立学校的传统运用于文华书院的办学中,由是校园的文化生活更加活跃起来。在体育活动方面,学生们星期六下午休息,除了一些中国式的体育游戏,对西方传入的足球、棒球等体育项目也爱好起来,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是放风筝、踢毽子或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城墙上散步的校园生活状况。1901年,文华还举办了武汉地区第一次校际运动会。在文化生活方面,同在1901年,一份手抄本形式的学校刊物——《文华年鉴》(The Boone Chronicle)出现在文华校园内。同年,由于贝克曼先生(Mr. Brockman 或译为巴乐满)的来访,文华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起来了。这种学生组织在神学学生领导下活动频繁,不仅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而且促使学生们常常走出校门,尽己所能服务社会。星期天晚上,学生们通常进图书室翻阅有插图的刊物。学校还按照西方习惯来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圣诞节时,全校师生受到了学校给予的中国式宴会的招待;复活节时,学校举行宴会招待毕业生,邀请毕业后在武汉生活的校友回母校参加节日庆祝,借此维系和加强师生之间、毕业生与学校之间的友好联系。学校的学年改为两学期后,原先学年结束时向优秀学生颁发奖金也演变为散学仪式。作为学校长久发展的事业基础,文华还开办了一所校医院<sup>①</sup>和一座图书馆。

文华图书馆创建于1902年。它是韦棣华小姐(Miss Mary Elizabeth Wood)积极努力的结果,也是韦小姐在华最得意的事业。韦棣华是美国纽约巴塔维亚(Batavia)的一名图书管理员。1899年11月,她从美国纽约来到中国武昌,看望在文华任教一年多的弟弟韦德生(Robert E. Wood)并为其看守房子<sup>②</sup>。来华不久因无他事可做,她就开始在文华书院教一些英语课程。出于职业的本能,她很快就发现学校的书籍极为缺乏,而学生们的疑难并非全凭教师的口头讲授就能解决,于是她到处搜购书刊并动员教员捐献图书,先在校内建立起小型图书阅览室,同时依循欧美公共图书馆的理念,着手在文华创建图书馆的计划。通过她的努力,一

<sup>①</sup> 后来医院脱离开文华独立设置,改名同仁医院,即今位于武昌彭刘杨路的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前身。

<sup>②</sup> 据柯约翰所著《华中大学》,韦棣华来华看望的是其兄,但比柯氏更早接触韦氏且关系更为密切的沈祖荣先生则说,韦氏看望的是其弟(参见沈祖荣《韦棣华女士略传》,载《文华图书季刊》第3卷第3期,1931年9月),现从沈说。韦小姐来华以后,直到1931年春去世的30年间,一直致力于文华图书馆的建设和中国图书馆学科人才的培养,并且为此事业而终身未嫁。作为对其事业献身精神的褒扬,黎元洪曾以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的身份赞誉她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

座名为“文华公书林”的小型图书馆得以建成。1909年,该图书馆成为文华的学校图书馆,并于次年迁入一栋扩建后的楼房中,使该图书馆成为文华校园内最好的建筑物。在满足全校师生需要的同时,该图书馆还以下述三种形式积极地为社会服务:一是为武汉和其他地区的大学、中学派遣流动图书站;二是分别在文华校内、武昌大街设置公众阅览室各一间;三是每学期在馆内斯托克斯厅举办一次系列演讲。为了发展图书馆事业,韦小姐还安排了两名对图书馆工作感兴趣的毕业班学生沈祖荣和胡庆生<sup>①</sup>,前往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所属的图书馆学校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图书馆学训练。这两位就是中国首批出国专攻图书馆学的留学生。他们学成归国后回到文华,协助韦棣华开设起专门培养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图书馆学专业。所以文华图书馆的创办,既为文华书院在不久的将来升格为高等学府打下了良好的图书资料基础,也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开了先河。

## 二、文华大学的创建(1903年—1924年)

1903年,文华的事业上了一个台阶。学校成立了大学部,增设大学课程,并定学制为3年<sup>②</sup>。大学部成立之初,收进由文华书院中学部毕业的9名学生<sup>③</sup>。学校的教育“要旨”为:“注意泰西教育,兼顾中国固有的国粹及文学,而借基督教主义增进人格。”此后文华分为正馆(正科,即大学部)和备馆(预科,即中学部)两部分。作为学校的扩展,当年还建成了一栋二层楼房,名为东楼(又名科学楼)。此时的文华,已有外籍教师4人,中国教师7人,7个班学生共计144人。1905年,又有两位外籍教师加入,一位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理科硕士理查德先生(Mr. Howard Richards),另一位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戴维先生(Mr. David Yui)。除神学以外,还开设有文科和理科课程。开办大学教育以后,文华采用九年制:备馆(预科)从初中到高中共计6年,正馆(大学本科)为3年。在大学阶段,除神学院外,又相继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后来将本科改为4年,全校实行十年制教育。

学校的课程,除中文和英文外,还有数学、地理、历史、理化等。其中,中文(汉文)教学包括古文(内含作文)、读经和史纲等,英文包括读本、文法和作文,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神学教育得到了加强,神学成为学校一门常设课程。除神学外,学校注重英文和数学课,而不太看重中文学习。尤其是英语,高中学生已初步

<sup>①</sup> 沈祖荣,英文名塞缪尔·J. Y. 沈,后于191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士;胡庆生,英文名托马斯·C. S. 胡,与沈祖荣均毕业于纽约图书馆专门学校。

<sup>②</sup> Institu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in China, pp. 32~35. 转见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页。

<sup>③</sup> 《文华大学(1871年—1921年)》(英文版铅印本),第6页。这9名学生中,在第一学年有2人退学,其余7人一直坚持到完成3年的大学课程。



熟练,其课程除中国语文和历史外,全部用英文课本,教师亦用英语教学<sup>①</sup>。大学里更是如此,大学学生对英语都能运用自如。大学生中还有英语练习会,每周五晚上举行,大学生一律参加,练习英语讲演、辩论,或听教师、来宾作英语专题演讲。

文华升格兴办大学教育时,正值中国清末“新政”发展新式教育时期。1903年,清政府颁行了第一个新型学制,随之在1905年又明令废除科举,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艰难地跨上了第一步台阶。为了使自身的事业站稳脚跟并顺利发展,文华在加强课程教学的同时,也加强了学校管理。中学实行领班制,领班由校长从高年级学生中选出,向校长负责,协助校长及舍监管理学生,每周集中向校长汇报一周内学生的操行及学习情况。中学成绩优异者可跳级,不良者则留级。大学实行学分制,学分修满即可毕业。为奖励学生,每年年终结业时,每班评出第一名、第二名,以书籍为奖品,在举行毕业典礼时颁发。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上学期春季开学,下学期秋季开学。每年暑假2个月,寒假1个月。此外,每逢端午、中秋,各放假3天。学生全部住宿,养成以校为家的习惯。学生除在假期可以自由回家外,平时一般不准出校门。星期六下午不上课,需要外出者可以请假,但须经校长批准,且必须于晚六时半前返校,参加晚祷。所有学生,无论信教与否,均得参加宗教活动<sup>②</sup>。宗教仪式每日举行两次,早晚各一次,每次大约半小时,按圣公会公祷文进行,由校牧(会长)或牧师(会吏)领导举行,学生按规定坐、立、跪如仪。每星期日的三次宗教仪式<sup>③</sup>,学生一律强制参加,其中大礼拜和英文礼拜均由圣职人员讲道。学校对非教籍学生实行收费教育,另有三分之一的“吃教”学生免费。除较高的学费外,每人每月还要交纳一定的膳食费(吃教者除外)。食堂纪律同样很严,由舍监管理,学生用餐时八人一桌,一日三餐,两干一稀。学校还设有医药室,安排一位苏格兰籍医生为学生看病。此外,1903年来校的化学教师理查德(Richard),也能为学生医治一些小病。

随着学校事业的发展,文华的文体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1905年,在体育教师麦卡锡先生(Mr. MacCarthy)的努力下,文华大学的体育运动有了很大的起色。校足球队在华中地区所有球赛中都取得了好成绩。1907年,该足球队取名为“常

① 必须指出的是,虽说早在1878年就组织了神学院并招收神学学生,但直到1906年,文华的教学用语主要还是汉语;1906年以后,才全部改作英语教学。

② 1903年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曾派人来校磋商,愿付双倍学费让其孙子进文华学英语,只是不参加宗教仪式,但未得到学校允准。

③ 上午6时30分,圣餐;10时30分~12时,大礼拜;下午6时~6时30分,晚祷(中学生参加);7时~8时,英文礼拜(大学生参加)。